

# 大东亚会议研究

## ——兼论“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本质

李晓倩

**内容摘要** 在战争压力和国内社会危机日渐加重的情况下,日本召集亚洲各傀儡政权举行大东亚会议,试图促成“大东亚共荣圈”建设,挽救危局。但“共存共荣”的幌子掩盖不了日本的侵略本质,也无法改变日本最终战败的结果。

**关键词** 大东亚会议 “大东亚共荣圈” 侵略本质

DOI:10.13740/b.cnki.jiiohr.2018.04.007

1943年11月5日—6日,日本召集汪伪政权、伪满洲国、菲律宾、泰国、缅甸及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等亚洲各傀儡政权在东京举行了大东亚会议,通过了“大东亚共同宣言”。这次会议是日本构筑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重要一环。尽管日本极力鼓吹与亚洲各国的“共存共荣”,但无法掩盖其侵略本质。大东亚会议的召开并没能挽救日本战败的局面,实际上是“大东亚共荣圈”破灭的前奏。

### 一、大东亚会议召开的背景

第一,日本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战争形势和国内局面。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与此同时,日本陆军南方军(第25军)在山下奉文指挥下对马来半岛发起猛攻,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一度处于胜利态势。在东南亚地区,日军先后攻占泰国(1941年12月)、新加坡(1942年2月)、荷属印度支那(今印度尼西亚,1942年3月)、缅甸(1942年3月)、菲律宾群岛(1942年5月)等地。同时,日本陆军南海支队不断进攻太平洋上英、美控制下的一些岛屿,先后占领关岛、威克岛等岛屿。1941年12月12日起,日军对英军占领下的香港发动进攻,在短短半个月内存占领香港。

日本虽最初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役中遭遇惨败,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300多架舰载机和几百名飞行员。这是日本海军首次遭遇决定性失败,元气大为损伤。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日军战败,损失了大量舰艇、运输船、飞机和飞行员,从此在太平洋上由攻势转入防御。

在日本节节败退的同时,其欧洲轴心国同盟德国和意大利也遭遇了严重失败。1943年2月,30万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被苏联军队歼灭。同年9月8日,意大利向盟军无条件投降。尽管德军在12日救出墨索里尼并于15日组建了意大利法西斯共和政府,但三角同盟的一角已经坍塌。也就是说,大东亚会议召开前夕,不论是欧洲战场还是亚洲战场,战局的天平已经向盟军方面倾斜。

另一方面,太平洋战争未能像日本政府发动战争时预料的那样“速战速决”,战争所需的大量物资和人力造成了沉重的国内压力。自1942年1月起,盐、酱油等日用品就已经纳入了配给管理,纤维制品也开始实行“衣服布料票据制”。国内生活物资的匮乏情况在中途岛海战战败后日益加剧,政府开始要求国民艰苦生活,一切为战争服务。<sup>①</sup>1942年12月《写真周报》<sup>②</sup>第251号刊登了这样的宣传标语:“是谁将武器弹药裹在和服里、流入酒食中?战费就在诸君怀抱中啊。到今年末积攒五十亿,建造一艘武勋舰吧。”<sup>③</sup>随着战局的恶化,日本民众被大量抽调作战,严重影响了国内生产和生活,导致物资十分短缺,最严重的是食物供给日渐不足;同时,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封锁切断了日本的对外联系,尤其是涉及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供应受到严重影响,既削弱了日本的战争能力,又加剧了国内的物资匮乏。日本国内出现大量的以物易物和黑市交易现象,民众对战争及发动战争的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社会危机愈演愈烈。

第二,反法西斯国家已经进行了有效的力量整合。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美、英两国感到迫切需要协调反法西斯战略。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北部纽芬兰阿金夏海湾的“奥古斯塔”号军舰上举行大西洋会议。13日,签署联合宣言即《大西洋宪章》并于次日发表。《大西洋宪章》强调反法西斯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提出对法西斯国家作战的目的和重建战后和平的目标,对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反法西斯国家更加感到组成同盟、协调行动的迫切性。1941年12月—1942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华盛顿举行了代号为“阿卡迪亚”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美国提议并起草《联合国共同宣言》草案。1942年1月1日,美、苏、英、中等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该宣言。各国赞同《大西洋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宣布:第一,保证运用军事和经济的全部资源同与之处于战争状态的轴心国及其仆从国家作战;第二,相互合作,不与敌国单独缔结停战协定和和约。《联合国共同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最终成立。与之相对应,轴心国方面虽然也签署了一系列协定,如《日德意联合行动协定》(1941年12月11日)、《日德意军事协定》(1942年1月18日)、《日德间关于经济互助的协定》(1943年1月20日),但客观上的地理位置因素导致相互之间在实际作战中难以取得有效合作。尤其是日本,在远东战场基本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一度处于有利战势的日本并未有意识地对地区力量进行整合。随着战局的恶化,日本才逐渐意识到整合地区力量的重要性,大东亚会议便是其试图整合地区力量的一次努力。

第三,日本在大东亚会议各参加国施行的是间接统治。

1941年10月上台的东条英机内阁是一个集权内阁,东条英机一人身兼首相、陆军大臣,以后又兼任军需大臣、文部大臣等职,极其热衷于战争和扩张,并极力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东条在1942年1月21日第79次帝国议会上的演说中曾说道:“帝国现在正用国家的全部力量专心贯彻巨大广泛的大规模作战,向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大事业迈进。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根本方针,实际上渊源于建国的根本精神,使大东亚各国各民族各得其所,基于以帝国为中心的道义,确

① [日]早川忠典著,胡澎译:《“神国”日本荒唐的决战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93页。

② 《写真周报》创刊于1938年2月,是一本由内阁情报部(之后的情报局)编辑出版的周刊画报,1945年7月停刊。

③ 『写真週報』250号、昭和17年12月16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6031084600。

立共存共荣的秩序。”<sup>①</sup>日本在亚洲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由直接占领逐渐转为扶植并利用傀儡政权进行统治,目的在于将原本耗在各国战场的日军调去对付美军,同时通过傀儡政权获得资源。日本在大东亚会议各参加国施行的政策如下所述:

**伪满洲国** 1932年9月15日,《日满议定书》签订,尽管日本人未实施直接占领,但“满洲国”政府完全受制于日本人。张景惠为国务总理,国务院下设各部和具体办事机构。但真正的实权机构是总务厅,总务厅下设六科,负责制定政府的计划,总务厅厅长和各科科长均由日本人担任。国务院其他各部部长虽由中国人担任,但各部均配备一名日本人副部长,且各部总务局也均由日本人掌握实权。

**汪伪政权** 瓜岛战役日军惨败后,东条首相企图将中国战场上的兵力调去对付美军,并要求汪伪政权参战。1942年12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所需要的对华处理根本方针》,要旨如下:“国民政府的参战是打开日本和中国现状的一大转机,应根据日华合作的根本精神,专心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同时,应力图消灭重庆借以抗日的口实,和新生的中国一起真正为完成战争而迈进。”<sup>②</sup>对此,汪伪政权积极予以回应。1943年1月9日,汪伪政权发表对英美宣战布告,扬言:“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一扫英美之残暴,以谋中国之复兴,东亚之解放。”<sup>③</sup>同日,汪精卫与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发表《共同宣言》,称“大中华民国及大日本帝国为完遂对美国及英国之共同战争,兹以不动之决意与信念,在军事上、政治上及经济上作完全之协力”,并签订《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日本宣布交还在中国的专管租界,承认中国尽快收回上海及厦门鼓浪屿的公共租界以及北平使馆区,撤销在华治外法权,<sup>④</sup>试图以此笼络人心。

1943年5月,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定的《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提出修改《日华基本条约》,签订《日华同盟条约》。汪伪政权对此次修约十分重视,甚至表示:“此次条约修改如果成功,则吾辈对民族、对国家、对千秋万世均有交代,此心质诸天地鬼神毫无愧怍矣。”<sup>⑤</sup>10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特命全权大使谷正之在南京签订了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双方表示要“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并于各方面讲求互助敦睦之方法”,“互相紧密协力,尽量援助”。<sup>⑥</sup>日本通过该条约强化了“以华制华”,汪伪政权只是充当其掠夺资源的工具而已。

**泰国**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向盟国泰国提出了取道其境内进攻东南亚其他国家的要求。1941年12月21日,《日泰同盟条约》签订,规定:“日本国或泰国与一国或两国以上的第三国发生武力冲突时,泰国或日本国作为同盟国应负有义务立即支持对方国家,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方面予以支援……日本国及泰国约定,在联合进行战争时,如果没有相互的完全谅解,不进行休战或媾和。”<sup>⑦</sup>这就将泰国牢牢捆绑在日本的战车上。1943年5月29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的《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提出了对泰国的方针,决定将马来失地归还给泰国,并将掸邦的一部分纳入泰国版图。6月26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又具体规定了给泰国领土的范围:马来失地是霹雳州、

① 《大东亚建设的构想——东条首相在第79次帝国议会上的演说》(1942年1月21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1页。

②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420页。

③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 傀儡组织(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439—440页。

④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 傀儡组织(三)》,第412页。

⑤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34页。

⑥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 傀儡组织(三)》,第413—414页。

⑦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385页。

吉打州、吉兰丹州和丁加奴州等四个邦，掸邦的一部分则是指景栋州、孟板州。8月20日，日泰条约签字生效。

**缅甸** 日本为维持其殖民统治，对缅甸采取了承认其独立、扶植傀儡政权的方式。1943年3月10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缅甸独立指导纲要》，决定“在帝国的辅助下建立成为大东亚共荣圈一员的新缅甸国”。日本虽然承认缅甸独立，但确立了很多条款维护其作为实际殖民者的地位，包括：日本不参加缅甸独立筹备委员会，但负领导责任；国体与政体尽可能由缅甸人自己提出意见考虑决定，但就政体而言，采取领导者国家即日本的形式；在缅甸国政府内配置少数精干的日本人作领导；缅甸在军事上应与日本完全协调，对日本军队提供一切便利，且军队兵力及编制实际上由日本指导决定。8月1日，《日缅同盟条约》签订，同日《缅甸独立宣言》发表。缅甸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并被纳入日本为核心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内。

**菲律宾** 日本占领菲律宾后，实行军事管制，同时设置菲律宾行政府。1943年5月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通过《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提出尽快使菲律宾独立的方针。6月26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定了详细的《菲律宾独立指导纲要》，规划了菲律宾独立的时间表，并规定了“新菲律宾及日菲关系基本形态”，虽然提出要“在菲律宾群岛建立名实相副的、真正成为‘大东亚共荣圈’一员的独立国家”，但同时也制定了一系列条款来明确日本的实际领导权力：日本在认为必要的时期内，在菲律宾政府内设置必要的顾问，使之担负领导责任；军事上规定，菲律宾国与日本完全协调，对日本军队提供一切便利，军队兵力及编制实际上由日本领导决定；经济上服从大东亚经济建设计划；交通通讯由菲律宾自行管理，但主要设备须承认日本的使用权；等等。10月14日，《日本国与菲律宾国同盟条约》签订，同日，菲律宾发表独立宣言，菲律宾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

**自由印度临时政府** 印度长期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印度前国大党主席钱德拉·鲍斯决定投奔日本。在日本的扶植下，1943年7月4日，“印度独立联盟大会”在新加坡召开，鲍斯发表宣言，宣布成立印度临时政府。大东亚会议前夕（1943年10月23日），日本发表声明，宣布承认自由印度临时政府。

## 二、会议的筹备与召开

成立大东亚省，完成机构层面的准备。为加强对大东亚地区的管理，统合亚洲地区力量以实现所谓“大东亚战争”的胜利，日本内阁决定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大东亚地区政务的集中机构即大东亚省。对于外务省而言，大东亚省的成立将会分割并缩减其原有部分职权，因此外务大臣东乡茂德表示了强烈反对。1942年9月1日的内阁会议上，由于东乡外务大臣的反对而致使会议难以达成一致，被迫暂时休会，后东乡辞去外务大臣一职，由东条英机首相暂时兼任外务大臣<sup>①</sup>，内阁会议才得以复会，《大东亚省设立案》也得以正式通过。该案对大东亚省的设立作出了部署，明确了设立大东亚省的目的在于“实现大东亚战争之完结与大东亚建设之达成”，大东亚省的职责为“施行大东亚地区内各国及各地区的政务”。<sup>②</sup> 在中央机构方面，大东亚省集中负责施行大东亚地区（不包括日本本土、朝鲜、台湾及库页岛）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政务，纯外交事务则由外务省负责；大东亚省设

<sup>①</sup> 东条英机兼任外务大臣至9月17日，此后由谷正之接任。

<sup>②</sup> 「大東亜省設置二閣スル件」(極秘)、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3010012300。

大臣、次官,其下设官房及总务局、满洲局、支那局(下设第一部、第二部)、南方局四局;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外务省东亚局及南洋局、拓务省拓北局、拓南局及南洋厅的事务一律统一于大东亚省,而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外务省东亚局及南洋局、拓务省也将随着大东亚省的设立而废止;陆海军武官及民间人士均可就任大东亚省职员。9月1日下午,内阁情报局发表了《大东亚省设立纲要》,内容与上述《大东亚省设置案》基本一致。

11月1日,根据天皇敕令,正式成立了大东亚省,下设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南方事务局四个局,并废除原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及拓务省官制,规定大东亚省的职责是“为了策应陆海军,执行与大东亚地区内占领区域的行政有关事务”。曾任大藏大臣的青木一男被任命为大东亚大臣。大东亚大臣的权限很大,有权“管理有关大东亚地区(除日本本土、朝鲜、台湾、库页岛以外,以下同)的各种政务的实施(除纯外交以外)。帝国在该地区对各国商行的保护,有关各外国与帝国居留于该地区的侨民事务,和有关该地区移民殖民、海外开拓事业以及对外文化事业等事务”,并“统辖管理有关关东局及南洋厅的事务”。<sup>①</sup>大东亚省次官为山本熊一,他于1941年曾任日本外务省美洲局长,1942年曾短期担任过外务省次官。为方便大东亚省与相关各省的联络,在大东亚省内设立联络委员会。委员长由大东亚大臣担任,委员包括内阁书记官长、法制局长官、企划院次长、情报局次长、技术院次长、各省次官、陆海军务局长、大东亚省总务局长。大东亚省是负责大东亚地区政务施行的一元化综合机构,在大东亚会议的组织与筹备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在完成机构层面的准备之后,日本制定了大东亚会议的指导纲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1943年5月29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定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下面简称《大纲》),并决定奏请召开御前会议。《大纲》的方针确定为:“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帝国更要扩充和加强以帝国为中心的大东亚各国各民族相互团结的政治姿态,并坚持领导战争的主动性,以处理世界形势的变化。政治策略的整顿充实,至迟应在本年11月初之前完成指标。整顿充实政治策略的重点,在于加强各国各民族在战争方面对帝国的合作,特别要解决中国问题。”根据此方针,《大纲》概要部署了对满、华、泰国、法属印度支那、缅甸、菲律宾等的政策,并在第七条“大东亚会议”中明确指出:“随着以上各项政策的实现,在本年10月下旬(在菲律宾独立以后),使大东亚各国的领导者会聚东京,向中外宣布‘大东亚共荣圈’业已建立和完成战争的坚定决心”。<sup>②</sup>这是日本政府首次明确提出召开大东亚会议。

5月31日,御前会议召开,出席者政府方面有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国务大臣兼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大藏大臣贺屋兴宣、大东亚大臣青木一男、外务大臣重光葵,统帅部方面有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参谋总长杉山元、参谋次长秦彦三郎、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枢密院方面是议长原嘉道。<sup>③</sup>会议的议题为讨论通过《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首相东条英机对议题做了说明之后,经过一系列讨论,《大纲》得以通过。此后,大东亚会议的筹备事务逐渐展开。

1943年10月2日,第165回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召开,有两大议题:一是大东亚会议召开,二是菲律宾岛独立日期。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大东亚会议案》。该文件指出了召开大东亚会议的目的,即“完成大东亚战争,进一步整备和强化以帝国为中心的大东亚各国集结的政略态势”。文件对会议的具体日程与安排亦作出了规定:参加者为日本、“满洲国”、“中华民国”、泰国、缅甸、菲律

①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417页。

②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427—429页。

③ [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赵宝库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95页。

宾,若自由印度临时政府成立则作为旁听者出席;与会代表为各国政府首脑,向各国代表发放全权委任状,各国代表的随员应控制在最少名额;会议于1943年11月5日在东京召开,为期两天;议题为“战争完成与大东亚建设的方针”,应在各国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向国内外阐明完成战争的坚定决心和“大东亚共荣圈”确立的方针;议事日程第一日为日本首相致辞、各国代表陈述见解、审议议案,第二日为通过议案(日文文本下附以中文译文和英文译文)、日本首相致辞;致各国的邀请函应于10月中旬之前发出,事前应以非正式形式通知;做好保密工作。<sup>①</sup> 这一文件的制定,对大东亚会议作出了总体部署,标志着大东亚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步入正轨。

日本作为会议的东道主,成立了负责准备各项具体事务的“菊号委员会”,即大东亚会议委员会,下设事务局。“菊号委员会”的委员长由大东亚大臣青木一男担任,副委员长由内阁书记官长星野直树、外务次官松本俊一、大东亚次官山本熊一担任,委员包括宫内省式部次长、内阁情报局长、内阁总务课长、外务省政务局长、内务省警保局长、大藏省主计局长、陆军省军务局长、海军省军务局长、大东亚省总务局长、东京都次长等。在“菊号委员会”下设立事务局,事务局长为大东亚次官,会计为大东亚省大臣官房会计课长,下设四部:总务部负责与会议相关的总括性事务,部长为大东亚省总务局长竹内新平;营缮部负责东京都内的住宿、运输及警备事务,部长为满洲事务局长今吉敏雄;议场部负责议场的准备和记录等事务,部长为支那事务局长宇佐美珍彦;接待部负责宾客的送迎及仪式宴会等一切接待事务,部长为南方事务局长水野伊太郎。<sup>②</sup> 菊号委员会及其事务局是大东亚会议的具体筹备机构,包揽了会议相关的各项事务。从菊号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来看,大东亚省是其绝对主力,尤其是从事具体筹备工作的事务局,几乎全部由大东亚省的官员组成。由此可见,大东亚省在筹备大东亚会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会议的运营委员会,成立大东亚会议事务局,由各国代表的随员各两名及必要的主管官员组成。(参见表1)

表1 大东亚会议事务局成员构成

	国家	成 员
大 东 亚 会 议 事 务 局	日本	大东亚省总务局长竹内新平
		外务省政务局长上村伸一
	“中华民国”	“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
		“国民政府行政院”副秘书长薛逢元
	泰国	外务省东方政务局长韦斯特·安特友库
		外务省一等书记官翁沙瓦·泰瓦坤
	“满洲国”	外交部政务司长大江晃
		外交部理事官郑隳散
	菲律宾	总统拉乌雷尔
	缅甸	外务次官修艾鲍

事务局第一次会议于1943年11月3日在帝国议会议事堂举行,商议以下事务:大东亚会议议

① 「大東亜会議に関する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2120222400。  
② 「大東亜会議開催及会議ノ状況/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2955900。

事日程细目、各国代表演说草案、大东亚会议宣言案、会议第二日各国代表发言要点、发表相关事项、会场使用的相关事项等。其重点商议的事项有以下六项：第一日推荐主席时，泰国代表提出任命日本国代表为主席的动议；菲律宾代表应赞成以上动议；议案通过后，“满洲国”代表应表明将来再次召开同样会议的希望；缅甸代表应以支援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为主旨进行发言；应给予自由印度临时政府首班发言的机会；“中华民国”代表在会议闭幕致辞中应表达对主席的感谢。<sup>①</sup>会议当天的确是遵循这些安排进行的。

至此，一切准备就绪。1943年11月1日—3日，“中华民国”、“满洲国”、菲律宾、泰国、缅甸及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各国代表相继到达东京。按照既定安排，11月5日—6日，大东亚会议在帝国议会事堂召开，以“战争完成与建设大东亚的方针”为议题。会议按照“菊号委员会”事务局事先安排好的日程进行。

11月5日会议第一日，首先在泰国代表汪瓦塔雅昆的提议下，全场一致推选日本国代表、东条英机首相为主席。东条英机在开幕式致辞中首先感谢各国对“大东亚战争完成与大东亚新秩序建设方针”的赞同，感谢各国出席大东亚会议；继而强调英美帝国主义对亚洲国家的侵略，认为其称霸世界的野心是“人类的灾难和世界的祸根”，将太平洋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到英美方面；由此鼓吹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正义性和神圣性，盛赞日军英勇善战，“几乎将整个东亚的英美侵略势力驱除”，称日本发动战争的根本要义是确立世界和平、确保大东亚的安定，并宣扬所谓“相倚相扶”“万邦共荣”和大东亚建设。<sup>②</sup>

东条致辞之后，“中华民国”代表汪精卫发表演说，强调大东亚会议是一次“世界史上有着伟大意义”的会议，指出东亚各国依赖日本的军事及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力量抑制了英美的侵略野心、保全了东亚，盛赞日本“基于东方道义精神谋求与东亚各国各民族共存共荣，支持其独立自主，助其达成爱国夙愿，使各就各位，各尽其最大努力，共同分担大东亚战争完成和大东亚建设达成的责任”，对日本“崇高伟大的抱负和光辉的功绩”表达敬意，并用孙中山提出的“大亚细亚主义”为其投奔日本找托词、作辩解。汪精卫还指出英美的挑拨是重庆对日抗战的根源、而重庆抗战则是导致中日关系破裂的原因，为配合“大东亚战争”的需要，今后的工作重点是整肃思想、保障治安和增加生产，并多次表达跟从日本进行大东亚战争和大东亚建设的态度以及“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决心。<sup>③</sup>接下来泰国代表汪瓦塔雅昆、“满洲国”代表张景惠、菲律宾代表何赛·拉乌雷尔、缅甸代表巴莫依次发表演说，演说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表明对日本的赞赏、感谢和追随以及对所谓“大东亚共荣”的拥护。

11月6日会议第二日，东条英机提出大东亚宣言的议案，各国代表对此进行讨论之后，通过了“大东亚共同宣言”，提出了共存共荣、独立亲善、文化昂扬、经济繁荣、贡献世界发展等“五大原则”。

#### 大东亚共同宣言

盖确立世界和平之根本要义，在于世界各国各得其所，相倚相扶，共享万邦共荣之乐。

然而，美、英为本国之繁荣，压迫其他国家及其他民族，特别对于大东亚进行贪得无厌之侵略与剥削，逞其奴役大东亚之野心，终将根本动摇大东亚之安定。大东亚战争之原因，即在于此。

① 『大東亜会議（調書）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2958700。

② 『日本国代表東条内閣総理大臣閣下ノ挨拶及所見』、『大東亜会議演説集』、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2958300。

③ 『中華民国代表汪行政院院長閣下ノ一般の所見』、『大東亜会議演説集』、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2958300。

大东亚各国应互相合作,完成大东亚战争,从美、英之枷锁下解放大东亚,完成其自存自卫,以下列纲为基础建设大东亚,以求贡献于世界和平之实现:

一、大东亚各国互相合作,确保大东亚之安全,并以道义为基础,建设共存共荣之秩序。

二、大东亚各国应互相尊重其独立自主,实现互助敦睦,确立大东亚之亲睦友谊。

三、大东亚各国互相尊重其传统,发挥各民族之创造性,以提高大东亚之文化。

四、大东亚各国应在互惠之下紧密合作,谋求其经济发展,增进大东亚之繁荣。

五、大东亚各国应与万邦敦睦交谊,消除人种差别,普遍进行文化交流,进而开放资源,以贡献于世界之发展。

在缅甸代表巴莫的提议下,前来旁听会议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首班钱德拉·鲍斯发表演说,表达对日本的感激之情,盛赞大东亚会议“不是战胜者之间瓜分战利品的会议,也不是牺牲弱小国家、充满阴谋的会议,更不是欺瞒弱小邻国的会议,而是被解放民族的正义会议,是基于各国间互惠主义及相互援助等原则召开的旨在创建该地区新秩序的会议”,并表明了对大东亚战争、大东亚共荣的支持态度。<sup>①</sup>

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继而发表闭幕致辞,指出会议的三点成果:第一,大东亚会议在认真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各国均率直地阐明了其见解,这是东亚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获得了全世界的瞩目;第二,各国毫无隔阂地交换意见,其结果是互相确认了彼此对于完成大东亚战争的决心和建设大东亚、确立世界和平的理想与热忱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期待各国将会彼此相信、相和、相倚、相扶,从而实现其共同理想和使命;第三,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了《大东亚共同宣言》,该宣言向全世界昭示了大东亚各国的战争观及和平建设的理念,具有大宪章的性质,写下了世界历史上新的篇章。<sup>②</sup>

此后,“中华民国”代表汪精卫发表致谢演说,表达对会议主席东条的感谢,并指出,“大东亚共同宣言”的特色在于“昭示了东亚的道义精神,摒除了欧美功利主义的见解”。汪精卫在致谢演说中还表明了追随日本、支持大东亚战争、拥护大东亚建设的决心:“将带领国民效仿先进国日本,与泰国、满洲国及新兴的缅甸、菲律宾、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同心协力,履行‘大东亚共同宣言’,从而实现大东亚共存共荣之建设。目前中国尚未统一,中国若早日统一,便可早日集中全国之心力、物力,分担大东亚之责任,将竭尽全力的于此。”<sup>③</sup>此后,会议宣布结束。

### 三、大东亚会议与“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本质

“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实施对外侵略的一项重要国策。“大东亚共荣圈”战略早在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的“第二次近卫声明”中即初露端倪。该声明提出:“帝国所祈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次征战之最后目的,亦在于此。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

① 『自由印度政府ボース首班閣下ノ発言』、『大東亜会議調書/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2958100。

② 『日本国代表東條内閣総理大臣閣下ノ閉会ノ挨拶』、『大東亜会議調書/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2958100。

③ 『中華民国代表汪行政院院長閣下ノ謝辞』、『大東亜会議調書/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2958100。



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集合。”<sup>①</sup>1940年7月26日内阁会议决定的《基本国策纲要》提出“皇国之国是以基于‘八纮一字’这一肇国之精神,迎来世界和平之确定为根本。首先要建设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根本的大东亚新秩序。”<sup>②</sup>此后不久,外务大臣松冈洋右于8月1日会见记者时宣称“必须力图确立以日、满、华为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这是首次正式公开使用“大东亚共荣圈”这一说法。日本政府试图在亚洲建立起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会议就是“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重要一环。但是,日益不利的战局使日本在各地的殖民统治渐次瓦解,因而大东亚会议也是“大东亚共荣圈”破灭的前奏。

大东亚会议召开后,日本及东亚各傀儡政权纷纷赞美其“划时代意义”。比如,《申报》在大东亚会议召开的第二日就发表社论称:“大东亚会议是在团结一心的情绪下,为完成共同目标而推诚商讨,以事实粉碎英美的奸诈。……由于盟邦日本领导奋斗的结果,亚洲人的亚洲的理想,今日已经完全实现,所以,大东亚共荣圈的外形,事实上已达最高理想的境地。”<sup>③</sup>尽管各国极力鼓吹大东亚会议的重要意义,极力粉饰“大东亚共荣”,但无法掩盖其侵略本质,也不能挽救日本战败的局面。

大东亚会议是日本编导、各国配合演出的一出闹剧。参加会议的各国诸如伪满洲国、汪伪政权、自由印度临时政府,都是未被国际上普遍承认的,因而并不能代表亚洲各国的立场。大东亚会议在日本主导下召开,从会议召开时间、地点、主题的确定到具体流程、发言内容,事无巨细全都由日本一手安排好。1943年11月3日,“菊号委员会”事務局议场部议事组制定了一份名为《关于议事的发言姿态》的文件,对各国发言顺序、提案内容甚至是每句话、每个动作表情都作出了详细说明,俨然一部细致翔实的“剧本”。而会议当天也确实是在按该“剧本”进行的。另外,会议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基本上都是各国对日本的歌功颂德与力表忠心,是日本面临日益恶化的战争形势而试图安抚内外的一次挣扎和努力。随着战争胜利的天平逐渐偏向盟国一方,日本试图将其殖民统治下的东亚地区力量整合起来用于战争。同时,为安抚国内的恐慌心理和厌战情绪,日本召开此次会议以显示其在大东亚地区并没有失去各国的支持。正如周佛海在日记中所说:“此举,日本之意,恐对内意义重于对外,盖示日本国民以各国与日本之合作也。”<sup>④</sup>

正如大东亚会议所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一面鼓吹“大东亚共荣”和帮助各国赢得独立,一面又强调以日本为中心,一切服务于日本的战争需要。这一自相矛盾体现了“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本质。日本认为自己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其他民族“应该忍受战争所必然引起的经济困难,不应该因此而抱怨,他们也应高兴地共同事业提供劳役和其他一切力所能及的援助”。<sup>⑤</sup>在这样的逻辑下,日本对被纳入“共荣圈”的亚洲各国进行了残酷的侵略。

日本将各国列为“帝国资源圈”,将其作为资源来源,并制定了详细的掠夺计划。1942年2月21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应如何使用帝国资源圈》的文件,决定:“帝国资源圈为日本、满洲、中国及西南太平洋地区,在此地区内力求扩大生产自给;澳洲、印度等地是它的补给圈。”<sup>⑥</sup>同年12月2日的《写真周报》毫不掩饰地打出了“大东亚占领地的资源正决定着今后的作战实力”这

①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278页。

② 「基本国策要綱」,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44700。

③ 《大东亚会议》,《申报》1943年11月6日,第1版。

④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第941页。

⑤ [英]F·C·琼斯等:《1942—1946年的远东》, [英]阿诺德·托因比主编,复旦大学外文系英文教研组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8),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

⑥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396页。

样的标语。<sup>①</sup> 日本不仅掠夺和征用钢铁、煤炭、粮食等各种资源,造成当地资源短缺,而且大量印刷和发行纸币,用于购买粮食和其他物资以及劳力,引起通货膨胀、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日本占领菲律宾期间,没收机动车、冰箱、缝纫机,装船运到日本,还强行接管了当地的商店,接管矿井和森林进行开发。菲律宾总统拉乌雷尔也曾抱怨,日本掠夺了菲律宾的重要商业企业,交给了日本公司。<sup>②</sup> 同时,日本人控制当地企业,垄断当地水陆交通,并垄断物资的出口;还通过招募和强制征集的方式获得当地劳动力,用于日军兵站后勤部和运输工作,修筑机场、铁路和公路。在缅甸,日本人建立了一家糖业公司接管和控制了当地的糖料生产,当地农民不得不按照该公司的定价将糖卖给他们。<sup>③</sup> 不仅如此,日本人还残酷处理当地政治犯。本想借日本之力将缅甸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实现缅甸独立的德钦党的一位成员叹息道:“以前英国人在吸你们的血,现在,日本人在这里吸你们的骨髓。”<sup>④</sup> 当时的缅甸首相巴莫在战后审判中说道:“当地的日本军事当局对于缅甸即使是表面的独立也不想给予。”<sup>⑤</sup> 除了直接掠夺和强行控制之外,日本在各占领地的学校聘用日本教师,推行日语教育,并按照日本的意图修改课本。<sup>⑥</sup> 如上所述,各国的实际情况与日本所描绘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繁荣景象和光明前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此,各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反日运动。

日本和各傀儡政权极力渲染的“王道乐土”无法掩饰日本的侵略本质,同时也无法掩饰“大东亚共荣圈”内部分裂的事实。尽管各傀儡政权纷纷向日本表达忠心,但日本的强力压制并不能取得真正的齐心协力。战后,曾任缅甸傀儡政权首相的巴莫抱怨道:日本人不顾他的反对,组织了缅甸独立筹备委员会,制定宪法的工作也是日本人做的;缅甸独立宣言和日缅同盟条约都是由日本人起草准备好的;对于新诞生的“缅甸共和国”,日本保持着严格控制。如果说巴莫对日本的态度是“敢怒不敢言”的话,那么泰国首相銮披汶则是通过称病拒不出席大东亚会议的方式表达了对日本的不满。各傀儡政权与日本的合作本身就是建立在日本侵略的基础上,因而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只是名存实亡,其矛盾和分裂是必然存在的,日本鼓吹的“共存共荣”也只是自欺欺人的骗局。日本试图通过召开大东亚会议来挽救不利战局,维系“大东亚共荣圈”。但事与愿违,大东亚会议正是“大东亚共荣圈”破灭的前奏。在战局基本已定的情况下,日本试图借由大东亚会议对东亚各国进行力量的整合,但这种“迟到的整合,已经不能帮助日本在军事上翻身,只能延缓日本帝国的死亡时间”。<sup>⑦</sup> 盟军节节胜利,到1945年8月15日,此时距会议结束还不到两年,日本便宣布投降。日本的战败也宣告了其苦心经营“大东亚共荣圈”的彻底破灭。

〔李晓倩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国祥)

① 『写真週報』249号、昭和17年12月2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6031084400。

② 《英国检察官 Comyns Carr 对山本熊一的交叉询问》(1947年3月7日),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第29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64—17971页。

③ 《英国检察官 Comyns Carr 对山本熊一的交叉询问》(1947年3月7日),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第29卷,第17946—17951页。

④ [英]F·C·琼斯等:《1942—1946年的远东》,[英]阿诺德·托因比主编,复旦大学外文系英文教研组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8),第93页。

⑤ [英]F·C·琼斯等:《1942—1946年的远东》,[英]阿诺德·托因比主编,复旦大学外文系英文教研组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8),第94页。

⑥ 《英国检察官 Comyns Carr 对山本熊一的交叉询问》(1947年3月7日),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第29卷,第18004—18005页。

⑦ 雷国山:《走向大东亚会议的历程》,《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

the extraterritoriality, those measures failed to achieve any obvious effect, instead, those activities increased fiercely. This reflects the unprecedented sharpness of the national conflicts in North China including Peiping, which indicates that Peiping had entered a “partially-occupied” state with growing crises.

## 5. Chinese Government’s Investigat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of the Criminal Evidence of the Unit 100 of the Japanese Invading Army .....

..... Qin Shiqiang, Wang Wenfeng(51)

In 1936, Unit 100 of the Japanese Invading Army was established in Xinjing of Manchukoku, which used the livestock and crop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conducted a large number of experimenting on human being. When Japan surrendered in 1945, Unit 100 blew up buildings and destroyed the criminal evidence of the biological warfare. Most of the members of the Unit 100 fled to Japan and some were captured by the Soviet army.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China conducted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riminal evidence of the Unit 100 in connection with the need to bring Japanese war criminals to trial together with the Soviet Union, and expose the crimes of the biological warfare of the US army in the Korean War. Participants in this investigation included Japanese who used to have contacts with the Unit 100 in Northeast China and Chinese labors who worked in the Unit 100. They helped us to clarify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Unit 100 and provided precious materials for the following studies on the Unit 100.

## 6. On the “Railway-care Village” in the Occupied Area of North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of Resistance .....

Wang Zhanxi(59)

“Railway-care Village”, also known as “Road-care Village” or “Road-maintenance Village”, is a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Japanese puppet regime in the occupied areas to protect the railway. The “Railway-care Village” in the occupied areas of North China was first established by the propaganda and relief squad of Japanese Army and then controlled by the Japanese North China Transportation Co., Ltd. “Railway-care Village” had not only the military function expected by the Japanese army to protect the railway, but also the political role of maintaining the order of the local region plus its economic function of plundering the raw materials and labor force of the occupied areas. The Japanese puppet regime used the military force to force the villagers of the “Railway-care Village” to join the road-protecting activities, while carrying out the policy of conciliation to win the people’s support. With its rigorous ruling, the “Railway-care Village” became the “fortress” of the Japanese puppet regime to maintain its railway safety in the occupied area of North China.

## 7. Studies on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nference——Also on the Aggressive Nature of the

**“Greater East Asian Co-prosperity Sphere” ..... Li Xiaoqian(70)**

With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war situation and the pressure of the growing domestic social crisis, Japan convened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puppet regimes in an attempt to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and to solve the crisis. However, the disguise of “Co-existence and Co-prosperity” failed to conceal the aggressive nature of Japan, nor could it change the result of Japan’s final defeat.

**8.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ison Affairs in the Occupied Area of Hena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 Cao Shulin(80)**

Due to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the system of the prisons in the occupied areas of Henan Province was seriously damage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uppet regime, a series of reconstruction work was carried out, however the recovery situations of the prisons in different places were inconsisten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prison reconstruction process was very slow.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the various prisons, the puppet government had carried out many measures in custodial ability, reporting system, prisoner control, but those measures failed to be well implemented and had become a mere formality. Meanwhile, the food supply for prisoners in each prison was always insufficient, the prisons were in the state of dilapidation with extremely poor health and medical conditions. The labor work of the prisoners and their behavior modification existed in name only, and the life and health of prisoners couldn’t be guaranteed.

**9. The Japanese Army’s Strategic Bombing of the Artesian Well of the Rear Area ... Cheng Yayun(89)**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full-scal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ith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moving to Chongqing, large areas of east and central China’ had fallen in succession.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artesian wells as one of the well salt bases in the rear area became prominent soon, which were gradually taken seriously by the Japanese as one of the key targets of the strategic bombing. The Japanese army and naval air forces bombing of the artesian wells consisted with their strategic bombing towards the rear area all the time. The air force of the Japanese Army and Navy used to bomb the artesian wells during the “Operational Plan No. 101” and “Operational Plan No. 102”.

**10. Research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Studies on the CPC’s Bases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Taihang and Lvliang Mountains ..... Yue Qianhou(94)**

Taihang Mountain and Lvliang Mountain are important strategic pivots of North China. In the full-scal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these two mountains served as both a supporting platform for the cooperation and mutual response of the “Two Battlefields”(the fron-